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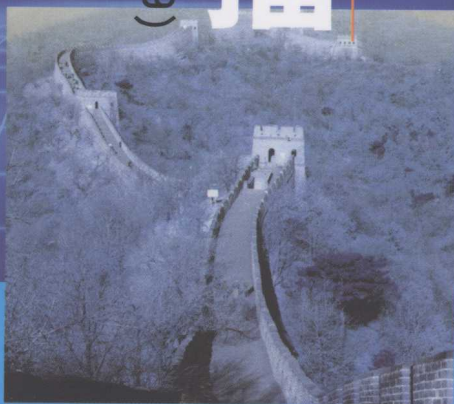


西方史学在

中国的传播

李孝迁 著

(1882—194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史学在 中国的传播

(1882—1949)

李孝迁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李孝迁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617-5519-8

I. 西… II. 李…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1882~1949②史学—传播—研究—西方国家—1882~1949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9766号

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

著 者 李孝迁
项目编辑 孔繁荣
文字编辑 洪 煜
责任校对 胡 静
封面设计 高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昆山亭林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13.125
字 数 366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9月第一版
印 数 3100
书 号 978-7-5617-5519-8/K·296
定 价 22.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绪 论

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与西方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传统史学向现代的转型,即直接在西方史学的观照下进行,尔后现代史学的走向也深受其影响。何谓中国“现代史学”,以哪个时段作为与“传统史学”的分界线,学界对此恐怕分歧很大。如果从制度层面分析,1903年清政府出台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从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以及分科大学堂都设历史课程,尤其文学科大学分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中国史学门主课设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中国古今外交史、世界史、西国科学史等,万国史学门主课则有史学研究法、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西国外交史、年代学等,初具“五四”以后各大学历史系课程设置的雏型,当可视为现代史学诞生的象征性文件。如果从观念层面考量,《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前,19世纪末在西学影响之下,传统史学内部就产生出了异己力量。如1890年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批评,传统史书所载,“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而于国势民情则略焉不讲”,而“西史则间及于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以覩人材之进步,制作之源流焉,此亦纪载之所不可废也”^①。戊戌变法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的新史学主张则已超出传统史学的范围,而具有鲜明的近代史学意识。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借西方史学观念,对传统史学来了一次总清算,在史学界振臂一呼,四方响应。因此,人们一般把梁启超《新史学》作为现代史学产生的标志性文献。现代史学出现的端倪虽然可追溯到19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但现代史学建设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则是“五四”以后的事情了。

我国现代史学内部又有众多流派。冯友兰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钱穆分为“传统派”(亦称“记诵派”)、“革新派”(亦称“宣传派”)、“科学派”(亦称“考订派”);曾繁康提出“考据学派”、“唯物史观派”、“理学派”。综合考察现代史学发展取向以及各派力量,主导民国史坛首推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创的“考据学派”(亦称“新历史考据学派”),成为现代史学的主流和正统,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考据学派史学即是现代史学。其他具有不同倾向的职业史家群体虽对现代史学的发展也有所贡献,然都不能与考据学派相提并论,多少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现代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学院化,研究现代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各大学历史系及研究院的史学活动。以史语所、北京、清华、辅仁、燕京等大学为大本营的新历史考据学派,不但以书籍的记载为考据的根据,而且极注重发掘各种遗物,以之与中国旧史料互相参证。诚如曾繁康所言,考据学派是中国最大的历史学派,“其态度较富于客观精神,其方法亦较为严谨,故如领道得法,中国将来的史学界,仍以此派为最有希望”^①。劳干也认为胡适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和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两篇文字“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②。考据学派之所以能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除了诸位史学大师的不懈努力外,他们治学重事实、重客观的取向,符合了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能将中国史学引向正确之路。考据学派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民国史坛最大最有势力的史学流派,在于它将传统史学的“土法”与西方实证史学有机结合起来,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20 世纪上半期西方史学在中国史坛出现过两次传播高潮。第一次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史学最初通过国外传教士和国人编

^① 曾繁康:《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责善月刊》第 1 卷第 5 期,1940 年 5 月 16 日。

^② 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 1979 年版。

著的外国史地著作得到零星松散的传播。传教士的知识结构和宗教使命,决定了他们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和传播必然极为浮浅而又非自觉。国人编著的外国史地作品很少关注史学理论问题,对西方史学的认知尚处于较低水平。1882年颜永京翻译出版斯宾塞《肄业要览》,这篇文字在西方近代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对晚清史学界发生过重要影响,所以本书名时间界限始于1882年,以示《肄业要览》在西方史学东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但是译者恐怕更多从教育角度考虑翻译这本书,而它在史学界所产生的作用,则皆非译者始料能及的。戊戌变法前,我国对西方史学了解甚少。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最初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发生在1898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初达到一次高峰。这次西方史学的东传直接引发了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运动,开启了史学近代化之门。应清末新式学堂教科之需和新史学思潮的推动,20世纪初翻译和编译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历史教科书(包括支那史、东洋史、西洋史、万国史),这些历史课本蕴含了大量的西学新知,是传播西方史学的重要载体。新史学思潮受晚清社会运动的影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界对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态度,以批判为特征的文明史学受到近代学人的青睐,而强调文献考证的兰克史学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近代史学思潮与社会变革互动的一个显例。20世纪初,法国孟德斯鸠、伏尔泰、基佐的文明史学、英国史家巴克尔的文明史学、日本的文明史学,均在不同程度上输入中国。同时,西方近代各种史观如科学史观、地理史观、人种史观、英雄史观等,几乎在同一时间里传入中土,活跃于晚清学界,多少改变了当时“学问饥荒”的局面。在20世纪初西方史学东传过程中,梁启超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他的新史学思想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其意义在于介绍和传播,而不是创造发明。

新史学思潮在批判传统旧史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在现代史学建设方面成就非常有限。在制度上,尽管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而实际发挥了多大作用仍值得考究,当年文学科大学的万国史学门就缺少师资而没有开设,章程中规定的一些课程是否能如期开设都成问题。

各地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相当混乱,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仍以翻译和编译国外教科书为主;在观念上,西方各种史学观念一时涌进中国,虽能激发学界探索理论问题的兴趣,但一知半解、生吞活剥的现象十分严重,对有些概念的理解牵强附会,风马牛不相及。西方史学新学说、新理论犹如走马观花一样登台亮相,然多数又没有扎根于本土。外来史学观念只是趋新学人借以批判传统史学的一种工具,近代史学观念在史学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两者严重脱节;在方法上,传统史学发展至清代乾嘉,形成了一套训诂、考订、校勘等方法,从时间上看,并不晚于西方。19世纪西方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断积累,发展形成了史料考订(包括内证与外证)、理解史料、编著成书一套系统而精密的方法程序。如果与我国传统史学方法相比,“土法”就略显不够科学了。20世纪初西方史学方法借径日本输入中国,但没有在史学界开花结果。一方面,对执着于求新求变的新史家来说,史学界的首要任务是“破”,侧重建设层面的史学方法似乎未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土法”仍然发挥着作用,史学方法的引入并非当务之急。因此,新史学思潮诚然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走上了艰难的史学近代化道路,但在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方面成就颇小,传统史学在史学界的势力不容低估。现代史学全面压倒传统史学,有待于“五四”以后新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这一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空前繁荣,鲁滨逊的新史学派,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兰克史学、唯物史观在民国史坛影响最大,而新康德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新黑格尔学派(克罗齐、柯林武德),甚至弗洛伊德的心理史学,这股西方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潮在学界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拥有部分信奉者和传播者,这多少让人怀疑“斯土见事素迟”(钱钟书语)之说的可信度。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百花齐放,丰富了民国史坛。民国时期对西方史学的引介与前者相较不断趋于合理化,这种转变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认识的深化,以及西方史学对现代史学建设影响的强化。20世纪上半期西方史学在中国的行

程,具有三方面的特点:

一、传播路径由日本转向欧美。这种变化只是说明一种趋势,并不是绝对的。20世纪初西方史学进入中国取道以日本为主,这与当时留日学生的急剧增多密切相关。传播媒介主要是期刊和翻译书籍。如《译书汇编》、《游学译编》、《大陆报》、《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都是留日学生创办于日本,然后运回国内销售的。20世纪初有关西方史学的中文文献大部分都与日本有关,便是最好的例证。但这不是说这个时期欧美渠道不存在,只是与日本相比,略显次要而已。欧美传教士所创办的杂志(如《中外见闻录》、《万国公报》)、翻译书籍(如《地学浅释》、《万国通史》、《进化论》),以及传教士的著述,对西方史学都有所涉及。更何况,当时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懂欧美语言,直接从西方向国内介绍西方史学,如南洋公学译书院译《英国文明史》、译书公会报译《英民史略》都取自英文原著。“五四”史坛则改变了以往转贩自日本的被动局面,开始直接从原产地欧美获取西方史学资源。“五四”前后留日学生大为减少,更多学生赴欧美留学。这个时期不仅有大批留学欧美学生归国,如胡适、何炳松、徐则陵、李思纯、陈衡哲、傅斯年、姚从吾、陈寅恪等等任教于各大学历史系,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外籍史学教员来华执教。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史学理论和方法著作都翻译自欧美原著,如鲁滨逊的《新史学》、班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肖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弗林特的《历史哲学概论》、司各脱的《史学概论》等等。通过日文本了解西方史学,已远不能满足史学界的需求。民国史坛对西方史学的接纳表现出了全方位的姿态,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为例,不仅有从德文本、英文本、法文本,而且还有日文本、俄文本等诸多渠道获取斯宾格勒的史学思想。日本作为中国东邻的一个强国,近代以来对我国的影响始终是存在的,如李大钊、朱谦之、杨鸿烈等人都是从日本接触西方史学。传播渠道从日本转向欧美,反映了中国对西方史学认知水准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

二、传播内容由理论转向方法。所谓理论和方法,只是相对而言,

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容易区分。传播内容的选择是受本土史学的需求决定的。从理论到方法的转变正反映了现代史学建设由破到立的演变过程。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对各种史学理论的介绍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诸如科学史观、地理史观、人种史观等一度盛行,而史学方法则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时期兰克史学在中国的处境相当艰难。“五四”前后在史学专业化的推动下,史学方法论开始受到新一代史家的高度重视,翻译出版了一批方法论著作,如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弗领的《历史研究法》,有的还出现过多种中译本,“史学方法”成为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的必修课程。传播者对传播对象的认识也经历了由粗浅到深入的过程。从文献形态上看,20世纪初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认识极为肤浅,“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①,以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为主,即使介绍性的文章多数也是根据日文资料转述而来,如汪荣宝的《史学概论》、吴渊民的《史学通义》、刘成禺的《史学广义内篇·人种第一》等。甚至对西方史学存在曲解附会的情况,国人自己撰写较为深刻的评论性著述极少,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处于较粗浅的阶段。民国史坛则对西方史学的理解比前者大为进步,留学欧美主修史学者不断增多,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西方史学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认知水平。这一时期出现了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各种史学概论、史学通论性质的著作,期刊上发表的大量评论西方史学的专文,这些都说明了民国史坛对西方史学的认识达到了较高水准。从传播内容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看,20世纪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西方(日本)的文明史学,然也只停留于观念层面,没有产生什么成果。而民国史坛中的鲁滨逊新史学派在历史教育界和史学理论界具有很大的势力,对史学史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贡献,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则有40年代战国策派的史学遗产,兰克史学对现代史学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则更是深远。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三、传播主体由业余转向职业化。20世纪初中国史学近代化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职业史家群体,留日学生对引发西方史学之东传虽有所贡献,然其本身的知识结构及其政治使命,对西方史学不可能有很深入的了解,也不会全心致力于传播和介绍工作。近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他当时关注的焦点也不是绍述西方史学而是政治活动。20世纪初自觉意识到输入西方史学者极为少数。“五四”前后一批留学生在欧美各大学接受了史学专业化训练,先后回国任教于各地大学,对推动中国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发挥了巨大作用。从事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也都是职业史家如何炳松、李思纯、余楠秋等人。鲁滨逊新史学派之所以在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在于这个学派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生。同样的,法国实证史学之所以在我国现代史学建设中留下了深刻痕迹,也在于瑟诺博司拥有李思纯、李璜、陈祖源、周谦冲等一批留法学生。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在清末。传播主体不仅指中国方面的,也包括国外人士。20世纪初我国从日本聘请了部分史学工作者如藤田丰八、坂本健一、服部宇之吉,从事国内西洋史的教学工作,但清末学校的历史教育体制很不健全,尤其对史学专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历史专业的设置还没有真正出现,日本教员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此外,早期传教士基本没有受过史学专业化训练,对传播西方史学的贡献也极为有限。但是,民国史坛中的外籍史学教员对现代史学的建设则有十分具体的贡献。这些人多数受过史学专业化训练,秉承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谙熟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不仅向中国学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而且还传授史学研究方法,与我国本土职业史家一起,开创了现代史学传统。

探讨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先行成果为数不少,对西方史学东传的整体进程作考察者有之,对某个史学流派、一部史学著作的个案研究者有之,篇目繁多,恕不能一一举征,见所附参考文献目录。对本课题的学术史回顾,仅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加以评述。台湾学者杜维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后发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前二者均收录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

学》、《德国史学的东渐》^①、《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②，是这个领域的最早成果。《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对 20 世纪前 50 年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了基本梳理，它分为三个时段：（一）初期（晚清），分析了西方史学开始输入中国时的思想界背景；强调西方史学首先输入中国的是历史进化论；肯定了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输入西方史学的功绩。杜认为严复译《天演论》是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之始，这是承袭了以往习以为常的一贯说法，没有作深入的考究。《天演论》出版之前，中国学界已经出现了批判传统史学的舆论，这些批评声音与传统史学没有直接的渊源关联，而与西方史学具有一定的学缘关系，足见晚清史学界中的“异端”言论，并非发端于《天演论》。对于 20 世纪初的梁启超，文中指出：“梁氏当时所了解的西方史学极为有限，他没有直接阅读西文书籍的能力，仅能间接从日文书籍晓得一些西方史学。”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错误，但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进一步探究梁从哪些日文书籍中获取了哪些西方史学资源，也没有注意到梁去日本之前的新史学思想的渊源问题。（二）第二期（1912—1937），是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最盛时期。分别讨论了梁启超、胡适、何炳松、傅斯年在引进西方史学方面所作的贡献。探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与西方史学的关系，后又作了更为专门的研究，发表了《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在文本上作了细致考辨工作，认为梁著参考过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当然不会只参考一种著作，杜氏忽视了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在梁著形成中的作用。（三）第三期（1938—1949），为西方史学输入中国“最缓慢”时期。抗日战争虽然对学术正常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并没有因此被打断，中外学人仍致力于介绍和传播西方史学，“最缓慢”之说似乎难以成立。《德国史学的东渐》原本是《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一册《历史方法论》所附的“后记”，介绍了姚从吾在传播德国史学尤其伯伦汉史学的贡献。《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论述西方实证史学

① 见《食货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71 年 5 月。

② 见《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 2 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5 年版。

尤其兰克史学对民国史学的影响,这篇论文的材料大部分已见于其他论文。杜文虽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然筚路蓝缕之功,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代表了海外学人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注意考察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俞旦初是国内最早研究该问题的学者,1982年他在《史学史研究》发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一文,其中“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输入和影响”和“西方文明史学思想的输入和影响”,以及其他相关论文如《20世纪初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后都收录在《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对西方史学东传的第一次高潮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大大推进了我们对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认知。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俞文主要讨论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中译文的出版、流传及影响。俞文虽然对《史学原论》各种中译本作了整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探究《史学原论》与梁启超《新史学》之关系,后来蒋俊的《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尚小明的《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对两者间的关系作了更为专题的研究;至于坪井《史学研究法》一书的理论渊源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俞氏对此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对于西方文明史学的输入,他着重考察巴克尔《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兼及法国文明史家基佐。俞旦初在80年代条件下作出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忽略了不少重要材料,但他扎实的学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研究成果成为后人继续探索的起点。

继俞旦初之后,对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作相对系统研究的是胡逢祥。1984年他发表《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第9期)一文,对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梳理十分全面,是对俞旦初研究的一次较大推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浮田和民《史学原论》与梁启超《新史学》的关系,俞旦初并没有作明确的说明,胡逢祥最先明白指出《史学原论》中

不少论述几乎全部为梁启超《新史学》所取，文中只引了一小段文字，又加注解说：“因原文太长，无法引录，读者自可寻原书对照。”这是一条关键性的提示，蒋俊、尚小明后来之所以有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极可能受此启发。

1990年胡逢祥发表《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学术季刊》第1期）一文，后收入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一书。从西方史学传入的最初途径与内容、社会学和历史学、近代史学专业理论的输入及其影响三方面加以探究，对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东传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当时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来自东西方的三股近代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德国的民族主义史学和日本的文明史学。1996年又发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学术月刊》第12期）一文，应是对前者思考的继续。他认为“五四”时期输入的西方各派现代史学可归纳为两大潮流：其一，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史坛占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包括法、德的实证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史学方法；其二，20世纪初西方兴起的各种反传统史学思潮，包括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史观”，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为首的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

研究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者，因具有对西方史学本身熟悉的优势，部分学者对西方史学东传的研究颇有兴趣。1987年何兆武在《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发表《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一文。这篇文章应该是近似回忆或随笔性文字，没有作更多资料的搜集工作，也没有参考先前俞旦初、胡逢祥的相关成果。文中指出：“新康德学派在西方曾经风行一时，而介绍到中国来的，梁启超之后竟成了绝响；另一个近代西方极有势力的流派，新黑格尔学派，在中国史学界也全无介绍。朱光潜介绍过克罗齐的美学，但克罗齐的非常重要而又有影响的史学理论，以及他的重要后学如柯林武德等人的史学思想，解放前一直无人问津。”又认为“从弗洛伊德以来各派心理分析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广泛应用”，在中国史学界得不到应有的反响。何兆武的这些结论都太过于随意，恐怕很难站得住脚。在梁启超之前，已经

有不少论著介绍过李凯尔特思想,如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的“史学思想史”课程专门论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对李凯尔特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论,远超过梁启超的只言片语。此后,介绍和传播李凯尔的论著更是数不胜数。克罗齐在“五四”时期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演讲中就已提到过(《杜里舒讲演录》第10期,1923年10月);朱光潜不仅介绍过克罗齐的美学,也介绍过他的史学思想,1947年他在《大公报》副刊《上海星期文艺》第16、17期发表过《克罗齐的“历史学”》,同年杨人楩在《大公报》副刊《上海文艺周刊》第25期发表了《克罗齐历史学中的自由概念》;至于柯林武德,1943年王绳祖在《思想与时代》第19期发表了《卡林伍德的历史思想》;“五四”时期杜里舒在《近代心理学中之非自觉及下自觉问题》(《杜里舒讲演录》第8期,1923年10月)一文中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简要的介绍,1930年出版了高觉敷译的《精神分析引论》以及章士钊译的《弗罗乙德叙传》、胡秋原的《历史哲学概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黄文山的《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等,都或详或略介绍过弗洛伊德。何兆武所提到的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大致可归属于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潮,虽然没有被中国主流史学界所接受,但一直有部分知识分子介绍他们的学术思想,这方面的史料相当的驳杂与广泛,日后将作专门的研究。

从事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张广智最近十年来一直关注于西方史学东传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①,是对这一领域用力颇勤的学者。其中《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对解放以前西方史学输入

^① 如《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应》(《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复旦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见瞿林东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的情况作了整理,分别讨论了梁启超、何炳松、李大钊、傅斯年、“战国策派”各自在传播西方史学方面的业绩。其他如《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亦有不少卓见,视野甚为开阔。2001年由鲍绍霖等编著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对西方史学本身的来龙去脉梳理过多,而对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影响反而着墨不多,似乎有点“名不符实”。即使论述中国史学部分,在史料搜集和思想阐发方面,也没有更多的进展,内容在此不赘述。李勇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最后两章专论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反响,传播群体包括何炳松、胡适、陈衡哲、蒋廷黻、张荫麟、《史地学报》,这是以往将鲁滨逊新史学与何炳松划上等号做法的一次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认知面向。但李勇认为陈衡哲、张荫麟两个人的某些史学思想与鲁滨逊新史学派相似,断定陈、张受过这个学派的影响,不免有些武断。事实上,1920年陈衡哲指定的预科学生历史参考书籍中,即有鲁滨逊的 *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 鲁滨逊和比尔德合著的 *Reading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海斯的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①。这是将陈衡哲与鲁滨逊新史学联系起来的一条直接证据。张荫麟是否受过鲁滨逊学派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早年致力于介绍西学新知,不遗余力,在20世纪初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梁启超新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是本书的重点。梁早年流亡日本,其史学思想与日本史学界关系极为密切,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但两者存在怎么样的具体关系,除了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对他有影响外,其他哪些日文书籍曾对梁新史学思想的构成产生过作用,目前知之甚少。2001年日本狭间直树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学》和2003年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发掘了部分日文史

① 《图书部典书课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6日。

料,两者虽很少直接涉及梁启超新史学的探讨,但对研究梁启超新史学的西学渊源问题,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日文资料的限制,国内对梁启超新史学与日本近代史学关系的认识较模糊,对这方面的研究水准较低。这个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大公案要呈现出历史的真相,仍需搜集中日双方各种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取证。

本书研究的着眼点在于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属于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的交叉边缘史研究,其所涉及的资料极为繁杂,包括文集、日记、笔记、讲义、译稿、档案,以及地理学、政治学、历史学著作及译著,报刊上的文章和广告,凡是能提高边缘史研究清晰度的一切文献资料,都应该尽可能搜集完备。以往研究方法多数采取中国几位学与西方某个史学流派相对应方式进行。西方史学流派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一定的反响,绝不是少数几位学者的努力就能实现的,这样也很容易忽视了西方史学引进过程中的其他诸多方面。应该尽可能扩大史料的搜索范围,不能固守已有的资料,作简单的整合,如此对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才有可能勾勒出比较清晰的传播路线。西方史学东传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件,重构历史事实首要工作应该是找寻一切可用的材料,给出一条 20 世纪上半期西方史学东传的基本线索,提供一个较之前人更为全面和更为清晰的历史画面。笔者对资料的搜集本着竭泽而渔的原则进行,其中发掘了一批新材料,对解决关键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所披露的材料有可能被参考者所分享,为谨慎考量,建议参考者使用本书提供的材料之前,最好再核对一下原文,以免因我的疏漏而给您带来麻烦)。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对找寻材料之艰难,笔者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对前人所提供的材料,都抱有一份敬意。遗憾的是,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本书出版之时,仍然有部分材料无缘得见。

西方史学的东传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所包涵的内容十分广泛,绝非三五年内就能对其作面面俱到的全方位探索。因此,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重点考察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西方(日本)史学思潮和流派(史观),时间跨度大致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原应纳入

本课题的研究计划,不过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而且对我国史学发展影响至大,有必要作独立的研究,故本书不涉及这方面的讨论,特此说明,以免分歧。

作为一项边缘史的研究,要兼顾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但不能喧宾夺主、主次不分。西方史学本身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但有必要了解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大致可参考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西方史学史译著和论著。本课题研究是在先行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重复前人工作,“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下,力求在即有的条件下有较大的学术推进。

本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其一,19世纪末至1911年辛亥革命,以考察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与西方史学关系为主,凡四章:第一章梳理清末翻译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的版本、流传及影响。汉译历史教科书不仅仅只是学堂课本,而且还蕴涵了不少西学新知,清季趋新学人往往通过这些不起眼的历史课本获取近代史学知识,从而引发检讨传统史学。汉译历史教科书是厘清20世纪初西方史学东传的一份重要资料,因此有必要先作系统的整理;第二章探讨西方(日本)的文明史学,它对新史学思潮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这样说,新史学思潮的灵魂就是文明史学。这章分别对法国的文明史学、英国的文明史学、日本的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较为完整的论述。清末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输入我国,受文明史学的影响,史学方法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而热衷于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如科学史观、地理史观、人种史观、英雄史观等,皆为人所津津乐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西方考古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对推进史前史和上古史研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三章将通过当时出版的各种书籍报刊资料,勾勒出西方各种史观和考古学在20世纪初知识界的传播轨迹。第四章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考辨梁启超新史学的西学渊源。通过考察重要语汇如“邻猫生子”、“家谱”、“君史”、“民史”形成的脉络,以及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与各种译著、日文本,作细致的文本比对、解读,使我们对梁启超新史学如何构成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